

联盟政治 理论与实践

刘丰 主编

Alliance
Politic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联盟政治 理论与实践

刘丰 主编

Alliance
Politic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盟政治：理论与实践 / 刘丰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203 - 2648 - 3

I. ①联… II. ①刘…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097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王桂荣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54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联盟是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之一，是国际安全领域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和互动形式。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安全形势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缔结的联盟历经形成、延续和衰败的生命周期，伴随着国家间战略互动的走向，也左右着地区或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进程。古今中外，围绕联盟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积累，不过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领域仍然有许多待解的问题需要挖掘。本书试图汇集中国学者在联盟政治这一国际安全核心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继续朝着精深的方向发展。

主编简介

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东亚国际关系研究。出版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编著《美国军事干涉与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国际关系中的预测：理论与实践》《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译著《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

封面设计：光天文化设计工作室
longhuidesign@163.com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GJ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 玮，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董柞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黄宇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刘 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刘若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宋 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苏若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生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孙学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杨 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杨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景全，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周建仁，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导论 联盟政治研究的议程与方向

刘 丰

联盟是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之一，是国际安全领域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和互动形式。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安全形势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缔结的联盟历经形成、延续和衰败的生命周期，塑造着国家间战略互动的走向，也左右着地区或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进程。古今中外，围绕联盟及其相关现象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不过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领域仍然有许多待解的问题需要挖掘。本书试图汇集中国学者在联盟政治这一国际安全核心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继续朝着精深的发展方向发展。

联盟概念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用来描述个人以及企业、政党、国家等社会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在国际关系领域，联盟通常是指仅限于国家之间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尽管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还会呈现出联合阵线、伙伴关系等其他形式，但联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且最为持久的合作形式。自人类形成以政治团体为基本单位的区分以来，联盟与反联盟就是这些团体之间互动与合作、竞争与对抗的基本方式。在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之后，国家间正式安全联盟的维持就从未间断。据“联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显示：1815年至2003年间，各国签订的正式军事联盟条约有648项，其中包括545项双边联盟条约和103项多边联盟条约，目前仍然

有效的条约有 100 多项。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有关联盟的研究众多,但是不同学者所讨论的概念仍然存在差异。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仍然存在分歧和细微差别。比如,格伦·斯奈德将联盟定义为“国家之间针对特定情形下对成员之外的国家使用(或不使用)武力而正式结成联合”;斯蒂芬·沃尔特提供的定义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间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由于他们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因此,并没有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化定义。相比之下,“联盟条约义务与条款”和“战争相关因素”这两个定量研究中常用的联盟数据库提供了更为严格和具体的操作化定义。比如,“联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的概念化定义是“独立的国家在面临潜在或实际军事冲突时进行军事合作的正式协定”,操作化定义是“由至少两个独立国家的官方代表签署的书面协定,其中规定,一方爆发军事冲突时提供援助,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彼此克制不发生军事冲突,或者在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国际危机中保持协商/合作”。总体上看,联盟是以正式条约或非正式协议的方式规定联盟成员应该承担的安全义务,协调它们在面对特定安全形势时对待彼此以及第三方的行为。

联盟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它们在国际冲突与危机中扮演的角色。20 世纪以来重要的国际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这两场全球性战争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等地区性战争,都是某一联盟(国家)对抗另一联盟(国家)的战争。在为数更多的国际冲突和危机中,只有较少一部分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联盟仍然在大国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美国领导的联盟实施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多场军事干涉行动。北约的持续东扩在欧亚大陆引发了新一轮地区安全危机,而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还围绕北约推进前沿军事部署、拓展军事基地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诸多议题展开。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是强化与盟友的安全合作,重新协调与盟友之间的安全义务,推动没有安全义务的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并且试图塑造盟友在经济、贸易和秩序构建中的行为。

由于联盟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联

盟政治发展成为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今天,关于联盟政治的研究跨越了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对外政策分析等国际关系主要分支领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联盟政治领域,联盟经常被当作一种被解释的国际政治现象,研究者们重点考察了联盟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方式从形成到瓦解的原因和机制,联盟维系的方式和过程,以及联盟的凝聚力和有效性等问题。同时,联盟也被当作一项用来解释其他国际政治后果和国家战略行为的要素,不少成果试图探究联盟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冲突、国际安全危机以及更广泛的国家行为模式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盟政治研究兴起开始,基于历史和当代经验的案例研究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工具。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定量研究的流行,联盟政治研究中定量方法也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定量方法甚至是在国际安全领域应用最广泛的议题之一。这主要得益于联盟相关的数据搜集、整理和积累及其所形成的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同时,在安全研究普遍趋势下,联盟与战争、危机和冲突等现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使定量研究得到推广。近年来,除定量研究外,案例研究仍然占据一定比例,同时,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兴方法逐渐凸显。

二

本书结集了过去几年间中国学者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开展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体现了我国学界的研究水平和进展。根据研究主题,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联盟的形成与瓦解、联盟内部管理、联盟与战略行为以及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崛起。

第一部分的三篇论文探讨了联盟的形成与瓦解。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合作形式一样,联盟具有从形成、维持到瓦解的完整生命周期,联盟政治的首要议题是探讨决定这一生命周期上某一特定过程及其转变的核心因素。

宋伟梳理了理性主义理论范式关照下的联盟形成研究,特别是回答了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制衡性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国

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以及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有哪些等问题。他指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总的来看,现实主义范式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不够,并没有提出解释联盟起源的新的核心概念,联盟起源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

曹玮和杨原关注了“两面结盟”这一特殊的联盟形成现象。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是一种并不常见的情形。他们发现,在古代东亚,高丽和朝鲜这两个朝鲜半岛国家却都曾与当时体系内相互对峙的头号和二号强国同时结盟。针对这一困惑,他们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给出了小国与两个彼此竞争的大国同时结盟的一般机制。首先,小国必须至少有两种必不可缺且仅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而两个大国(主观或客观上)分别只能满足其中的一种。其次,两个大国之间必须处于一种互有顾忌、彼此均无必胜对方把握的僵持状态。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下,高丽和朝鲜两个国家除了生存需求有赖大国的保护外,其政权的合法性也完全来源于中原汉族王朝对其的承认和册封。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成为体系强国后,为高丽和朝鲜提供生存安全和政权安全保障的大国就出现了分离,而两个大国的战略僵持催生了“两面结盟”现象。

周建仁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联盟在共同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走向瓦解。他以弱国自助能力与战略分歧构建了简约的联盟解体双变量解释框架,提出联盟内部的战略分歧大小决定了联盟成本的高低,而弱国的自助能力强弱则决定了其联盟收益的大小,从而在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联盟解体之间构建了一个因果逻辑机制。借助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最新数据库中的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周建仁对这四个统计分析假设进行经验验证。研究表明,弱国自助能力和战略分歧在对联盟解体发挥影响上是互为条件的。

第二部分的五篇论文主要关注联盟内部管理的问题。对于参与联盟之中的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和协调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联盟内部能够维持较强的凝聚力,运转有效,从而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和威慑能力。但是,在现实中,盟友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有效管理。

董柞壮认为,联盟的机制设置本身就会影响联盟可靠性,因为参与联盟的国家在进行机制设置时会充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他发现,国家设置更高水平联盟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联盟的可靠性,但是由于国家在联盟中成本与收益分担不同、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同,因此联盟机制的设置对联盟可靠性的影响是复杂且有条件的。

尹继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联盟形成的过程中,联盟信任是何时以及如何形成的?盟友间的信任是理性选择的产物,还是一种情感与态度的需求?从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出发,他综合既有的国际关系联盟形成理论和信任研究,建构了两种联盟信任形成的解释模式——弱式理性主义模式和社会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以北约的形成作为案例,他对理性主义和社会认知解释模式进行了说明。尹继武指出,在联盟情绪即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中,理性行为与认知因素均能产生情绪,两种解释各有所长,可相互补充。北约不仅是一种战略联盟,更承载了跨大西洋安全与道德共同体的身份。

苏若林和唐世平探讨了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之间互动的动态机制。他们发现,联盟维持和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这两个变量通过相互制约的核心机制影响联盟的命运。根据权力对比,联盟可以区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根据联盟内部的意图匹配程度,联盟可以区分为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对称性联盟中,如果盟友意图一致,那么彼此相互制约会相对成功,联盟也容易得到管理;反之,则不易管理。在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且弱国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时,相互制约才相对困难,联盟才较难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联盟、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苏联盟以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美日联盟为他们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节大磊考察了约束盟国的基本逻辑及其面临的困境。他指出,在事关双方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项上,约束一方需要传递两种可信的信息:一是约束一方认同被约束一方的战略目标;二是约束一方反对被约束一方的策略手段。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这两种信息的可信性较易相互削弱,这也正是约束盟国的困境所在。在美国约束以色列的案例

中，奥巴马政府成功地结合了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使之放弃了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案例中，布什政府对后者几乎无条件和全方位的长期支持使得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之间严重失衡。萨卡什维利政府有恃无恐地对南奥塞梯使用武力，从而引发了俄格战争，也标志着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以及格鲁吉亚的两个案例一方面为论点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约束盟国的困难性。

张景全从联盟运行成本的角度分析了联盟内部困境。联盟成本包括联盟硬成本与联盟软成本，前者指联盟的组织成本及联盟行动成本，后者指联盟的声誉与可信性。传统的联盟困境主要考察的是盟友牵连和抛弃的困境，忽视了新的联盟困境，包括联盟针对对象与联盟经济伙伴的同一性困境，以及在同一联盟体系内各个联盟之间存在猜疑与纷争的联盟间困境。这项研究发现，在联盟运行过程中，联盟硬成本与联盟软成本相互影响，传统联盟困境与新联盟困境相互作用，联盟成本与联盟困境相互制约。

第三部分的四篇论文聚焦于联盟对国家战略行为的影响。联盟改变了联盟成员的行为模式，在更广泛的层面塑造着它们的行为。一旦加入联盟，一国的对外决策和战略实施会受到盟友的牵制和制约。联盟首先体现在改变成员国的武器装备、军力部署、指挥体系和作战模式上。与此同时，联盟一旦形成，就会参与到联盟内外的国家间互动之中，对其他国家的战略考量施加影响。

刘丰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面对对手联盟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和对自身发展的阻碍时，一个国家如何主动采取措施削弱、限制和破坏针对自己的实际或潜在联盟。根据战略效果的不同，分化对手联盟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阻止新的潜在结盟国家加入对手联盟，促使对手联盟中的某些成员在对抗和冲突中保持中立，吸引某些国家在竞争中转而支持自己以及拉拢对手联盟中的成员加入己方阵营。根据与联盟政治相关的既有理论和历史经验，分化对手联盟战略可以被分为合作性战略、对抗性战略及观望性战略等三种主要类型。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进程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影响力构成了严峻挑战。面对北约向中东欧，尤其是独联体国家的持续扩张，俄罗斯试图

综合运用合作与对抗等多种手段阻止周边邻国加入北约。尽管这些战略努力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但是俄罗斯终止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进程的努力展示出分化对手联盟战略在当今单极体系下的成功案例。

黄宇兴分析了联盟转型的成败问题。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和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是解释联盟类型的两个主要因素。现有理论讨论了产生不同联盟类型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联盟转型成败的主要条件。黄宇兴提出，在不对称联盟中，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是解释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条件。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能力、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越强，联盟转型越容易成功；反之，联盟转型越容易失败。这项研究选择将1936—1937年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失败和1940—1941年德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成功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作者也指出，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有转型的可能性。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援助能力较强，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较弱。因此，美国成功实现亚太地区联盟转型的可能性不高。

孙德刚讨论了“准联盟”战略。准联盟战略是政治领导人运用次级安全管理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战略理念、机制和行为，它是联盟战略与中立战略之间的“灰色地带”，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隐性选项之一。联盟战略建立在正式盟约之上，其执行主要依靠法律约束力（硬约束），而准联盟战略建立在次级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其执行主要依靠道德约束力（软约束）。准联盟战略的主要特征包括，解决任务的选择性、合作手段的灵活性、战略指向的模糊性和主权让渡的有限性。作者认为，后冷战时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敌友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联盟战略效力下降。相比之下，准联盟战略日益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走向、国际权力格局转换和区域安全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杨毅考察了“安全联盟”对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影响。联盟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国家在安全上的需要，经济交往产生的安全外部性促进了结盟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增加，确保了联盟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发展。在联盟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联盟框架内存在的议题联系机制为

联盟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的同时实现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应的交往渠道和方式。同时，一国通过经济上的补偿性支付的方式向其盟国提供经济补偿，使其从经济上获益，从而确保了安全联盟的稳定。这项研究指出，根据联盟成员间的相互依存度和利益相容性程度，联盟会表现为实力增强型联盟、协调型联盟、霸权型联盟和飘忽不定型联盟等四种类型，联盟经济在各种类型的联盟中都会发挥作用，但在不同类型的联盟中，由于上述两个变量的不同，经济合作与安全利益的关联程度会有不同的表现，补偿性支付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四部分的四篇论文聚焦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崛起。在奉行不结盟战略的约束条件下，快速崛起的中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外部联盟体系。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会影响到美国东亚联盟体系的运转；另一方面，这一联盟体系也对中国的实力崛起和影响力拓展构成了实际和潜在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成为中国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

左希迎考察了美国维护与其亚太盟友的关系时所面临的战略难题。在全球战略收缩的态势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需求，这就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承诺难题”。作者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当前执行的是一种双重再保证战略，以应对其盟友与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这一战略通过增加对盟友的承诺，旨在维持联盟威慑的可靠性，避免联盟凝聚力下降。同时，美国私下划定盟友外交政策的红线，严格控制盟友外交政策的范围，避免被拖入地区纷争和冲突之中。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中，美国执行双重再保证战略的行为最具有代表性。然而，双重再保证战略存在三个方面的挑战，即中国继续成长所带来的外部压力、美国盟友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和美国战略调整的挑战。

刘若楠探讨了美国运用其权威塑造亚太盟国对外战略时的成效和限度。随着实力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外交和安全问题都集中在周边地区。中国在与美国的亚太盟国就领土争议、地区多边机制乃至经贸往来等议题进行博弈时，都难以回避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美国而言，保持对东亚盟国对外战略一定的“支配权”对于维护其主导地

位不可或缺。作者指出,在强制和利益交换这两种方式之外,美国在安全等级体系中建立的权威关系是其塑造东亚从属国对外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通过劝说和象征性惩罚等具体措施,美国能够成功地将盟国的对外政策约束在其所设定的行为边界之中。

孙学峰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面对美国在东亚以盟友和安全伙伴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护体系,中国如何缓解崛起困境。他指出,在美国东亚安全保护体系稳定延续的背景下,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必须将美国和周边国家两个重点有效整合,将中美邻安全关系纳入统一的政策框架,根据周边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程度和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心程度,对周边国家实施差异化的安全战略,以有效管控地区安全压力,稳步扩展地区安全影响力,进而有效缓解日益凸显的崛起困境。对于依赖美国保护且严重忌惮中国实力上升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可利用美国能够为其保护国设置“安全红线”的权力,联合美国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战略,提前采取行动防止这些国家(地区)跨越“安全红线”。对于依赖美国保护但对中国实力上升疑虑较弱的国家,中国可在不挑战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护关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战略支持,从而弱化美国安全保护体系的整体压力。对于严重忌惮中国实力上升但无法获得美国保护的国家,中国有必要坚持“一报还一报”的政策思路,统筹“安抚”与“进取”两类政策,弱化其与中国的对抗。对于无意依赖美国保护且对中国实力上升疑虑较弱的国家,中国应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其所需的战略支持。

凌胜利解释了中国坚持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原因。大国崛起进程中往往面临着安全压力增强的挑战,结盟成为缓解或化解安全压力的一种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崛起的安全压力有所加大,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中国需要反思和调整不结盟政策。作者指出,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具有内在合理性。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未来中国是否需要结盟必须基于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不应该因为过于关注安全利益损失或者基于未来的过度安全担忧而盲目结盟。

三

从国家间互动的历史看，联盟并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贯穿于国际关系历史进程的每一阶段。联盟也不是某一种特定思想驱动的产物，而是在国家追求安全、财富和威望等战略目标的驱动下的必要选择，伴随着国家间竞争、冲突与合作的各种形态。正是由于联盟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联盟的研究成为国际安全这一分支领域的重要议题。当然，传统的联盟政治研究也受到了现实的冲击和困境。这主要是由学术研究状况和国际政治现实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传统研究高度依赖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案例，围绕着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联盟现象构建了许多理论模型，难以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从当代的经验来看，联盟实践的案例也是非常有限的。除了美国领导的多边和双边联盟之外，并没有其他竞争性的联盟出现。但是，这些制约并不意味着联盟政治的研究已经陷入瓶颈，而是需要扩展议题和视野。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奉行不结盟原则，坚持主张不同任何国家缔结正式的军事联盟。当然，这一战略选择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不需要关注联盟现象，不需要从学理上探讨联盟现象对于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意义。相反，尽管中国选择不结盟，但外部联盟的存在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也需要选择联盟以外的安全合作手段。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联盟政治问题做了不少学理和政策的探讨，甚至试图在“不结盟”这一官方政策立场基础上有所创新。笔者认为，以下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探讨。

第一，联盟与其他安全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之后，国家之间涌现出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合作，比如安全机制、联合阵线、伙伴关系。与联盟相比，这些合作对安全承诺和义务的规定不是特别强。在这些合作形式中，联合阵线尤其值得关注。需要看到，这些安全合作方式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具有互补性的，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另外，不同国家对不同方式的需求和偏好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